离乡与返乡之间——《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乡经验与精神归宿

张吕坤

摘要:《一句顶一万句》以“离乡”与“返乡”的叙事结构，展示了普通人对自我精神找寻的艰难历程。文本中的“离乡”隐喻开始于故乡的生存压力、焦虑、孤独与隔阂，出走故乡成为精神找寻的第一种形式，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化为对“说得着”的默契与理解的寻找。“返乡”则通过曾经的生活经验、个体记忆与代际的情感传达，使故乡所承载的精神力冲进进入当下，成为理解自身，自我和解与辨认未来生活的动力。由此，小说所体现的精神归宿既表现在“离乡”与“返乡”间的保持内心所向，也体现为日常生活的互相理解（“说得着”）。小说借由故乡经验之线索，最终完成了对普通人艰难一生的陈诉与理解。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离乡；返乡；精神归宿

Between Leaving Home and Returning Home: The Hometown Experience and Spiritual Belonging in *One Sentence Worth Ten Thousand*

Zhang Lükun

Abstract: *One Sentence Worth Ten Thousand* tak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leaving home” and “returning home” to display the arduous course of ordinary people’s search for the self in spiritual terms. In the text, “leaving home” is metaphorically initiated by the survival pressure, anxiety, loneliness, and estrangement of the hometown; departing from the hometown becomes the first form of spiritual search, and in this process it gradually transforms into a search for the tacit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being able to talk meaningfully” (shuo de zhao). “Returning home,” through former life experience, individual memor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transmission, allows the spiritual power carried by the hometown to surge into the present,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understanding oneself, achieving self-reconciliation, and discerning future life. Thus, the spiritual belonging embodied in the novel is manifested both in maintaining one’s inner orientation between “leaving home” and “returning home” and i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daily life (“being able to talk meaningfully”). Through the thread of hometown experience, the novel ultimately completes the nar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rduous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Keywords: *One Sentence Worth Ten Thousand*; leaving home; returning home; spiritual belonging

刘震云曾在采访时说起一个故事：在那个集体粮票时代，镇上有个叫老孙的厨师，他是方圆几十里唯一吃得白白胖胖的人。有一次父亲想到老孙的饭馆里赊五个馒头。老孙理直气壮地说，No ！他说这件事情在后来发生了另一种变化：每当父亲和母亲发生矛盾，母亲都说，老刘你还说什么啊，你连五个馒头都赊不出来。五个馒头变成了五座大山，压在了他父亲的脊背上。这个故事其实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缩影，它从日常的生活史提炼了关于后来这部小说文本的三个关键处：贫困、说话的伤害，以及生活故土的精神经验。《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寓言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生活经验之作。“ 出延津记 ”与“ 回延津记 ”提示了借由“ 故乡 ”，完成对精神之寄托及求索上下。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 故乡 ”并非物理意义的某个地方或物理原点，而是由“ 说得着 ”的人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来的精神空间。小说以“ 出走故乡 ”和“ 返回故乡 ”的内在循环结构人物的生活史，又通过未说之话、人物改名、喊丧、手谈以及代际情感等叙事形式与方法，把人物寻找知己、抵抗孤独的生活经验最终转化为对精神归宿的找寻。“ 故乡 ”也逐渐由人物试图走出的现实场所，逐渐转化为确认自我、安顿内心与精神归宿的审美原乡。

一、离乡：现实生存与说话困境

苦难书写是河南乡土文学重要书写内容，生存苦难是其重要母题。李丹梦曾指出：“ 苦难代表着中原文化给予他们含混而深刻的记忆，是一种具有‘ 遗传性 ’的共通精神标志。 ”[①] 这样的论断为我们对刘震云的“ 故乡 ”原乡蒙上了一层厚重的底色，而《一句顶一万句》重构并展现了这样的苦难的、沉重的生活史与精神史。

《一句顶一万句》分两部分，“ 出延津记 ”及“ 回延津记 ”。“ 出延津记 ”是典型的“ 离乡 ”，以杨百顺不断离开原有生活关系为主线，写其从杨家庄到县城，再到宝鸡、咸阳的生活变迁史。杨百顺“ 出走 ”最初是对贫困和暴力的逃避，后来逐渐转化为寻找“ 说得着 ”的人的精神需求。

杨百顺第一次离开杨家庄是因为对父亲的恐惧。“ 杨百顺十三岁那年秋天，家里丢了一只羊。丢羊之前，家里人去找猪。杨百顺先天被雨淋着了，打摆子发烧，家里人去找猪，留他一人看家。 ”[②] 生病的杨百顺没有被照顾，而是被父亲老杨甩了几皮带，头上有了七八个血疙瘩后打发去找羊。在夜晚乡间田野忐忑恐惧中，杨百顺离开了杨家庄。这是河南这片土地最为普遍的存在苦痛，最熟悉的生活，也可能使人感到难以容身。对患病的杨百顺而言没有得到应有的照料，反而因为丢羊收到父亲的责罚。随后他吃的那碗海烩面似拥有某种寓言和具象化色彩：逃离杨家庄吃一碗烩面，可以暂时摆脱恐惧，获得温暖与饱足。

杨百顺第二次出走是因为他发现父亲老杨送弟弟杨百利去上“ 新学 ”的猫腻。“ 他没起床磨豆腐，借着上茅房，从后墙扒出去，一个人走了。他终于可以离开家了。或者说，他终于找到了脱离老杨和豆腐的另一个理由。 ”[③] 杨百顺对父亲安排的不满转化成他苦难的生存境遇，不断累加了其脱离原有生活的愿望。在离开卖豆腐的父亲后，杨百顺在老曾家学杀猪，在蒋家庄老蒋家当过染房学徒，去县城当了老詹的手下，还改了名字叫

① 李丹梦：《文学“乡土”的苦难话语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 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 11 期，第 120 页。

②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 15 页。

③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47 页。

杨摩西。并且阴差阳错进了县政府成为政府的种菜工。在老曾家杀猪，因为嘴巴不严实，得罪了师母。在蒋家庄染房因为放走老蒋钟爱的猴子而害怕出走。出走故乡带来的短暂抽离很快被另一种困境所取代，更换环境的难以安顿，让其发现除却谋生，他还需找到能听懂自己，回应自己的人。

离乡包含着多种意味的精神逃离，通过逃离熟悉的人物与关系，达成对既有关系，诸如压迫、隔膜、冷漠与孤独的摆脱。在杨百顺第一次离乡中，空间的迁移完成了内心的短暂安顿，但第二次的尝试证明“出走”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刘震云由此将离乡的书写往前推进，从对现实困境的逃离，深入到对精神归属的追问。这一略显抽象的问题，在小说的叙述中，逐渐转化为一种具体的生活愿景——找到一个“说得着”的人，能够倾诉心事，自己的话能够被回应。这是离乡漂泊后，情感得以寄托的最实在方式。“说话”因而成为连接离乡与说话的重要桥梁与线索。它得使离家的人获得继续前行的方向，也使故乡的意义在人与人的相互理解中被重新辨认。

“说话”关乎人的精神归属，在中国传统“人间世”这个伦理价值体系中，能和你说上话的人才是真正的知己。说话并不指社交、对嘴时候的伶牙俐齿，而是能说上几句贴心话，温暖灵魂的话，哪怕只有一句，也是“一句顶一万句”。

吴摩西与吴香香的婚姻生活，恰恰显示出了这样交流的匮乏：“比让去杀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过起琐碎日子，两人说不到一起。杀人是一时的事，过日子可是细水长流。吴摩西跟人说话吃力，吴香香跟人说话不吃力。”[①] 小说将一时之激烈与细水长流的琐碎生活并置，写出了“两人说不到一起”是对人的持续消耗。吴摩西与吴香香是夫妻，共同生活同吃共饮，但并不能保证心意相通，所谓“事不拿人话拿人”。在吴摩西入赘的这个家里，唯一能说得上话的是养女巧玲：“吴摩西与吴香香说不着，与巧玲说得着；巧玲与吴香香顶嘴，与吴摩西不顶嘴。能说到一起，哪里还用顶嘴。”[②] 同属亲密关系，传统家庭伦理的名分轻重在此时被忽略。与巧玲说得上话的情分，为吴摩西提供了情感依托。巧玲的失踪，也使寻找她成为吴摩西再次出走的理由。

至此，离乡不仅关乎生存的困苦，也承载重新连接情感的愿望。这次出走和吴摩西曾经所有的出走不同，过去是因为生存的苦难出走，现在是因为灵魂无法熨帖的苦难出走，寻找那个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以前吴摩西不理解死了女儿的老汪出走故乡，远走宝鸡，现在他好像突然明白了，“当年老詹说人信了主，就明白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吴摩西当初为了生计信过主，后来又不信了；不管信不信，一个最大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到哪儿去。”[③] 从被迫去哪儿，到寻求到哪儿去，吴摩西似乎逐步完成了他的精神巡礼。于是他又重新上路，并改名罗长礼，将对未来生活的寻找与对自身身份的重新选择联系在了一起。

从杨家庄到宝鸡、咸阳，杨百顺、吴摩西或者罗长礼的一次次出走，既是生活地点的物理迁移，也伴随情感跌宕变化。故乡的贫困、冷漠、隔膜与压迫，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难以找到心灵宿归，离乡与出走的空间远离，也并未消除人对理解与被理解的需要。离乡的更大意义，似乎是在说明找寻情感寄托的重要性，故乡的意义由此也在对“说得着”的人的寻找中重新获得确认。

①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160 页。

②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163 页。

③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207 页。

二、返乡：故乡记忆与情感追寻

离乡使人与原来生活拉开距离，得到某种程度的梳理感、陌生感，但却未能完全消除故乡的影响，也不能让“故乡”从文化记忆中完全消失。那些在故乡隔膜、孤独与困境中曾经给予了理解与慰藉的人与事，仍然存留在后来漫长的生活中，并使那个曾经离开的“故乡”原乡再次成为精神追寻的目的地。故乡的意义也在经历现实关系变迁与回望之后，逐渐地、再次显现。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返乡情结，同样出现在刘震云对 1995 年春交故乡的讲述中：“1995 年 3 月 24 日 8 时 25 分，小刘儿的姥娘去世。……小刘儿心中的故乡因此断裂。从此，他再说自己是孤儿和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就不是一种说法和矫情了。”[①] 姥娘物质形体的消失带给刘震云的不只是情感的伤痛，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精神的支撑点，“故乡”彻底坍塌了，没有了姥娘的“故乡”是一片巨大的精神废墟，故乡是他生活史的精神依附。在《一句顶一万句》下半部“回延津记”中，不管是曹青娥返乡，抑或牛爱国在母亲病逝后重返延津，都折射了作家对找寻故乡，从而找寻某种自身价值确认的巨大渴望。“回延津记”中的人，正是在回望自身与亲人时，重新建立了与故乡延津的联系。

在上半部中被拐的巧玲，下半部以曹青娥的身份重新出现，对她而言，延津首先承载了她与吴摩西共同的生活记忆。也即“故乡”承载着无法轻易替代的生活经验。曹青娥被人贩子拐走转卖给老曹后，她被动离乡，离开熟悉的地方，也失去和吴摩西的父女关系。曹满仓的老婆不许她提过去的事情：“以后不许想延津，也不许想你后爹；啥时候想这两样，啥时候挤你的秃疮。”对旧生活的切割，是和“故乡”的人与事联系在一起的。曹青娥的回望也同时包含着对地方延津与人吴摩西的依恋，这是那些故乡的缱绻的情感。新的家庭要求她对过往的切割，但往事并没有随身份与生活环境改变而消失，只是在无法言状的环境中被封存了起来。故乡因此成为一段被迫中断，但无法被割舍与替代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依赖。

后来曹青娥与老曹夫妇建立了情感，并与老曹老婆“说得着”，但直到临终前曹青娥喊了一声“爹”，不是喊的襄垣县爹爹老曹，而是多年前失散的爹爹吴摩西。可见在曹青娥心里，吴摩西才是打心底里那个最说得上话的人，和吴摩西的走失，成为曹青娥心中最大的孤独。曹青娥与三十五岁之后的儿子牛爱国说知心话，讲她回延津找老姜家的弹花铺，讲她去新乡找与吴摩西分手的东关汽车站，讲她去开封找拐卖自己的老尤。给儿子讲自己的梦，梦见自己“伏到自己的提包上，哭了。哭不是哭梦到了爹，而是梦中的爹，头又有了（形象又完整了），心却哭得很。”[②] 曹青娥的找寻，做的梦，都是故乡延津，她所寻找的既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地方，也是曾经自己的精神依托。故乡由此在她“离乡”后，重新获得了无法抹去的情感皈依。

同时地，对故乡的依恋，还发生在代际的情感传递。小说写吴摩西（罗长礼）的孙子罗安江与爷爷亲近。罗长礼许多话和老伴说不着，跟儿媳妇们说不着，即使是十几个孙子中，也唯独只和罗安江说得着。罗安江成年结婚后，遇到事情不和老婆何玉芬商量，唯独与爷爷罗长礼商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说：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人处在孤独的境地才能与自

① 梁鸿：《“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读〈一句顶一万句〉》，《扬子江评论》2010 年第 1 期，第 55 页。

②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273 页。

己相遇，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宇宙和自由，罗安江这个普通却略带点倔强的农民似在无意间触碰到人类诗学深刻的命题。在苍茫的原野上，只有爷爷罗长礼听到自己的呐喊，和自己形成灵魂上的交流。所以当罗安江知道自己得了胃癌，不久于人世后就闹着回河南延津，因之“罗长礼生前留下一句话，让他放心不下”。[①] 延津（故乡）对他的意义，与罗长礼留下的牵挂相连。曹青娥寻找的是自己失散多年的父女情分，罗安江执着的是与爷爷多年未了的往事。两者不同的“返乡”，表明对故乡的情感依恋不仅发生在曾经的生活经验中，同样可以伴随亲人的情感传递而传递。

这种代际的情感联系，还体现在曹青娥儿子牛爱国身上。在母亲给他讲完那些知心话，讲完如何对延津的找寻，以及对老爷吴摩西的梦见，那些多年未曾释怀的往事与“说话”，使牛爱国逐渐接触到母亲日常之外的另一个情感世界。曹青娥病倒后，她开始急于表达还没交代完全的话，在医院病重说不出话之际，用笔在纸上吃力地写了两个字：“回家”。曹青娥临终之际，让牛爱国找出八年前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延津老姜家的姜素荣写来的，曹青娥“让给姜素荣打一个电话，让姜素荣来沁源一趟，她有话要说，或她有话要问。八年前不想说的话，临终前突然想说：八年前不想问的话，临终前突然想问。”[②] 但这句话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牛爱国想弄清楚姥爷吴摩西究竟留下了什么话让母亲曹青娥临死都难以释怀，为了一句话，牛爱国“返乡”回了延津。

对牛爱国而言，延津并非自己生活之地，它是母亲的故乡。母亲的执着与疑问，将他与遥远的过往和延津联系在了一起。延津也由母亲口中的地名，逐渐成为理解她情感世界的具体所指。牛爱国当然无法重新经历母亲的过往，但却在“返乡”延津中了解明白一个事实，一段早已失散的故乡关系，何以深刻持续影响一个人。

小说最为巧妙的是牛爱国对母亲执着“返乡”的理解，无意间拯救了自己困顿的生活。理解母亲对故乡的追索，让其对当下生活也有了新思考。彼时的他正陷入与章楚红的情感纠葛中，牛爱国向章楚红讲述了自己出走沁源、寻找庞丽娜的经历，倾诉心里的疙瘩和难以对旁人说起的事情，两人似是“说得上”的心灵伴侣。但这份亲近并未转成共同的生活选择，他仍在顾虑与犹豫的进退间。母亲对故乡、吴摩西的长久眷恋，与牛爱国对章楚红的迟疑与牵挂，似乎形成了某种对照。沿着母亲所走的路，也使牛爱国思考与重新辨认自己情感所向。

母亲曾经对牛爱国说：“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③] 虽然曹青娥对故乡往昔牵挂良多，但却认识非常清晰：过去无法重来，未来的生活还得继续。牛爱国后来决定重新寻找章楚红，不能说不是受母亲影响。他对章楚红的寻找，意味着开始直面曾经回避的情感。虽然尚不能保证一段关系的重新建立，却使对往事的追问获得了面对未来的方向。

从曹青娥对故乡往昔经验的执着，到母子间的情感传递，再到牛爱国对当下生活的重新理解，故乡始终作为一个精神标示存在人生旷野中。“返乡”不能破镜重圆，不能让失去复归完整，但对“返乡”的追索，对“返乡”这个过程的执着，却能够帮助重新理解自己所处生活，并收拾前行之勇气，这未尝不是一种精神与情感的完成。

①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353 页。

②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320 页。

③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296 页。

三、精神归宿：超越日常与心意相通

在离乡与返乡的往复中，人们不断调整与确证，以谋求精神归宿何处，生活愿景的实现。《一句顶一万句》所提示的精神归宿，无外乎两处：人能够在生存之外保有精神向往（离乡与返乡），也能够在与他人交往中获得互相理解的慰藉（说话）。故乡在此时，便成为叙述的一个外衣。细观刘震云的小说书写，这样的叙事策略比比皆是，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到《故乡面和花朵》，“故乡”一直是其创作的重要对象。《一句顶一万句》延续关于“故乡”的想象，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完成对不易被察觉的精神世界的显现。故乡既包含对生活无处安放的现实窘迫，也保存着人间世难以割舍的情感缱绻。人物寻找的精神归宿，在小说具体叙述中不断生成。

精神的归宿首先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杨百顺的经历贯穿了艰难的谋生，但在做工与维持生计之外，喊丧、社火和乡土生活的各种言说，都曾使其着迷。“当年的罗长礼，是吴摩西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听罗长礼喊丧，也就是七八年前的事；现在想起来，却好像过了半辈子……从杨家庄到现在，和罗长礼关系最大。不是喜‘虚’不喜实，迄今他还在杨家庄跟老杨做豆腐。”[①] 杨百顺喜欢喊丧，并不因为它带来实际的生计受益，而是喊丧所代表的含混不清，所代表的“虚”即是他自己所处的人间世，他的精神空间——“舞社火有些‘虚’。所谓‘虚’，是一句延津话，就像‘喷空’一样，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②]“喊丧”“喜虚”“脱离眼前的生活”道出人超脱直接生计的需要，在日常劳作之外，还需可以投入情感、寄托心意的事物存在。这些需要并未使谋生之艰小时，但却可以让人保有渴望，不至完全被眼前处境所限。

梁鸿在评论刘震云小说时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和他同村的好朋友——按辈分，我应该叫大爷的，实际上，他比父亲还要小十几岁——他们经常彻夜长坐，夏天坐在我家院子里，冬天在屋子角落用玉米秆或树根烧一个小火堆，总是灰烬已凉还不回去。他们在谈些什么呢？无从知道，有许多时候，他们甚至是不说话的，就那样默默地盯着火光的暗淡。”[ⓒ] 并指出：“这些场景所具有的含义长期以来被我们的文学与文学史忽略。”[ⓓ] 这的确是我们长久以来忽略的场景，我们一度认为文学史的舞台尽是英雄与事工，殊不知亦有抒情与沉默。在文学史这些沉默的无声的“时刻”，我们重释对人，对人的精神需要的理解——人的精神之力往往也存在极平常的生活、动作之终极，那些劳作之外的彻夜长坐，让相伴本身成为值得珍惜的事情。

杨百顺的名字几易其稿，杨摩西、吴摩西，并最终改名罗长礼在，也正是这种精神超越的具体体现。名字的更替折射生活关系的不断变迁，也记录他自己对自身位置的寻找，同时也是他对生活的不断“突围”。改名并未使他摆脱生活现实困境，但却表明谋生与既有身份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全部期待。他最后一个名字罗长礼，将早些年对喊丧者的崇拜代入他对以后生活的选择，这个名字随他至死，保留着他自己所认定的重要经验，并从中获得安顿精神的力量。

精神归宿另一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在具体

①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208 页。

②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165 页。

③ 梁鸿：《“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读〈一句顶一万句〉》，第 55 页。

④ 同注③。

精神归宿另一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在具体关系中获得相互慰藉与理解。《一句顶一万句》塑造形象众多，有些人物关系密切，但却未必“说得着”。名分关系的亲密并不能保证内心的亲近，能够彼此回应、说得上话，才会使人感到有所依靠。杨百顺和巧玲如此，曹青娥与养母同样如此。除此以外，小说文本还有一处颇具象征意味的描写，即延津县县长老史与戏子苏小宝的手谈，给小说一直提及的“说得着”增添了几分哲思意味。小说写他们“就是在一起说个话。说话也不用嘴，而是用手，两人对面坐着，在下围棋，讲的是个手谈。就是扯到淫上，老史的做法也与众不同，讲的不是做，而是个‘意’”。[①] 两人通过棋盘落子应对交流，在棋局中体会对方心意：

从深夜手谈到天亮，两人竟手谈出一盘奇局。这棋局的名字叫“风雪配”。虽是和棋，但布局之奇特，机关之巧妙，一招一式，一板一眼，事先并不有意，也是随机应变，待到棋终，突然出现了大境界。整个棋局虽风云密布，但天苍苍，地茫茫，黑白之间，楔榫连接，出现了天作之合。这种天作之合，许多人手谈一辈子，也无遇到过；或许快接近了，又擦肩而过。手谈并不为输赢，为输赢者皆是俗物……不为手谈，不为棋局，为了这天作之合。[②]

此处将两人“说得着”放在双方默契契合之中，“随机应变”意味彼此能有呼应，“不为输赢”意味手谈的过程远胜一切。两人的满足是一种精神的满足，不为棋局，只为天作之合，自己的心意可以被理解并得到回应。这也是“说得上”的含义所在：不仅有话可说，还包含彼此默契的心领神会。小说文本在“离乡”与“返乡”的反复精神找寻中，这个手谈的场景给出了具体的指向。

这样的精神交往并无永久的保证，行行复行行，精神之归宿仍需在生活中不断找寻与确认。所谓“许多人手谈一辈子，也无遇到过；或许快接近了，有擦肩而过”正是此意。县长老史和戏子苏小宝他们的手谈以追求极致的精神交流为前提，下棋只是他们交流的一种方式工具，他们有意识地追寻空灵之境，虚实相生，讲究含蓄而有余味，无字处皆有其意。当他们的手谈被杨摩西无意撞见之后，不禁大怒，显示两人对这份默契的依赖。

由此，《一句顶一万句》所提示的精神归宿，不管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突围，想象另一种可能，亦或达成一种“说得着”的彼此理解与灵魂契合默契，都始终与具体生活相联系。刘震云曾将故乡理解为“一个社会整体”：“如果故乡是指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是指一个社会整体，即不但包括人、土地环境，还包括维持人、土地和环境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及生活方式或者说作为一种社区来考察的话，在一个民族内，这一块地方与另一块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风俗习惯虽有差异，但总是在同一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下；二者相较，前者显得微不足道……以这点意义上说，故乡就是国家，无论你生在哪里，都会给你身上和心上打上基本相同的烙印。”[③] 人的精神也诞生、成长于这样的生活经验之中。对故乡的回望与留恋，使人得以辨认曾经所珍视。而对当下生活的选择，则决定回望的生活史经验如何继续发生意义。精神的桃花源追寻，安顿与归宿，有赖于打破日常蒙尘心有所向，也有赖于在探寻过程中不断发现并建立可以“说得上”的联系与理解。

从离乡到返乡，这仿佛是中国人一生的缩影。借由故乡，我们完成了人生的出发与终点的折返，

①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134 页。

② 同注①。

③ 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文艺争鸣》1992 年第 1 期，第 73 页。

《一句顶一万句》讲言语，也讲我们精神的旨归。找寻的精神归宿既与故乡之象遥相呼应，也在当下生活中不断被建构。故乡中的生存压力与“说得着”的言语隔膜促人出走，曾经获得的理解与慰藉又使故乡成为难以割舍的记忆。这些复杂的生活史，不仅通过亲人在讲述与牵挂间相传，也让正在经历困惑的晚辈在理解他人过程中，重新理解当下的生活，获得拯救。故乡的精神意义，由此在离开、回望和重新选择的反复过程中不断被展开。

参考文献：

[1] 刘震云 . 一句顶一万句 [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2] 梁鸿 .“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读《一句顶一万句》[J]. 扬子江评论，2010 (1).

[3] 李丹梦 . 文学“乡土”的苦难话语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 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 [J]. 学习与探索，2013 (11).

[4] 刘震云 . 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 [J]. 文艺争鸣，1992 (1).

[5] 陈晓明 .“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 [J]. 南方文坛，2009 (5).

[6] 央视《面对面》栏目组 . 刘震云：文学之路 [EB/OL]. (2011-10-09)[2026-11-01]. http://tv.cntv.cn/video/C10359/ce706835cc274af9928d0a8fa8a1cefc.

作者简介：

张吕坤，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章太炎研究。